



“十二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



中国少数民族
文物图典

中国民族博物馆东北亚驯鹿民族文化卷





国家出版基金项目

“十二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

中国少数民族 文物图典

中国民族博物馆

东北亚驯鹿民族文化卷

中国民族博物馆 编

辽宁民族出版社

© 中国民族博物馆 2016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少数民族文物图典. 中国民族博物馆东北亚驯鹿民族文化卷 / 中国民族博物馆编. — 沈阳: 辽宁民族出版社, 2016.5

ISBN 978-7-5497-1336-3

I. ①中… II. ①中… III. ①少数民族 — 历史文物 — 中国 — 图集 IV. ①K874.0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6) 第116371号

中国少数民族文物图典. 中国民族博物馆东北亚驯鹿民族文化卷

ZHONGGUO SHAOSHU MINZU WENWU TUDIAN. ZHONGGUO MINZU BOWUGUAN
DONGBEIYA XUNLU MINZU WENHUAJUAN

出版发行者: 辽宁民族出版社

地 址: 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25号 邮编: 110003

印 刷 者: 辽宁新华印务有限公司

幅 面 尺 寸: 210mm×285mm

印 张: 15

字 数: 100千字

印 数: 1-1000

出 版 时 间: 2016年5月第1版

印 刷 时 间: 2016年5月第1次印刷

责 任 编 辑: 金顺玉

封 面 设 计: 杜 江

责 任 校 对: 洪傲松

标准书号: ISBN 978-7-5497-1336-3

定 价: 300.00元

法律顾问: 陈 光

版权专有 侵权必究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

网 址: www.lnmzcs.com

举报电话: 024-23284336

邮购电话: 024-23284335

联系电话: 024-23284340

淘宝网店: lnmz2013.taobao.com



中国民族博物馆东北亚驯鹿民族文化卷



总序

民族文物是各民族历史和文明的载体，是伴随着各民族形成和发展的历史过程留存的民族文化遗产，是探索和研究人类社会发展的的重要资料，也是进行民族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爱国主义教育、民族团结教育的珍贵教材。

民族文物有广义和狭义之分。从广义而言，从民族产生以来人类留下的有历史、艺术和科学价值的遗物、遗迹等实物资料皆为民族文物，其中包括考古发掘品、传世文物和近现代民族文物。从狭义而言，民族文物则主要指近现代各民族所使用的具有民族特点的实物资料，包括各民族的传统生产生活用品、服饰佩饰、宗教用品、工艺美术品等。

从历史的纵向来看，民族文物可分为古代民族文物和近现代民族文物两部分。古代民族文物是指我国古代各民族人民创造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历史遗物、遗迹等实物资料。近现代民族文物是指近代以来，各民族在社会生产活动中遗留下来的具有民族特色和历史、艺术、科学价值的遗迹和遗物。

从历史的横向分析，民族文物可分为可移动民族文物和不可移动民族文物。可移动的民族文物是指各民族创造的具有本民族风格和特点的，反映其社会制度、社会生产、社会生活的各种器物，如生产工具、生活用品、工艺美术品、服饰佩饰等。不可移动的民族文物是指不可或不宜整体移动，特别是无法与其周围环境一块儿移动的民族文物。不可移动的民族文物主要有具有民族历史、民族风格和民族文化特色的各类遗址和建筑物，如城址、寺庙、石刻、楼阁、亭桥、作坊、民居、村舍、娱乐场所等。

就存在的形式而言，民族文物又包括有形民族文物和无形民族文物两种。有形民族文物以物化的形式存在，简单而言就是指各民族的物质文化，即各民族创造的具有民族特色和历史、艺术、科学价值的实物。目前，在全国各地的民族博物馆里收藏和展出的民族文物大多数是有形民族文物。无形民族文物主要是指各民族的传统习俗活动，它基本属于精神文化范畴。虽然有些无形民族文物可以通过物化的形式表现出来，但是这种表现形式是不全面的。无形民族文物有许多自己的表现形式，如富有民族特色的音乐、舞蹈、口头文学、传统体育、婚恋习俗、礼仪庆典、民族工艺、生产技能、语言文字、图画符号等。此外，民族文物还有着民族性、地域性、物质性、精神性、不可再生和不可替代性、价格的客观性、民族文物作用的永续性等基本特点。

民族文物是各民族的宝贵文化遗产，是中华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民族文物的征集和保护工作始于20世纪二三十年代，当时正值中国民族学学科的创立时期，一批学者深入到民族地区进行田野调查，开始了民族文物的征集工作。新中国成立以来，在各级党委和政府的重视下，经过几代文物、民族、博物馆等工作者的共同努力，许多珍贵的民族文物得到了初步抢救征集和收藏保护。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民族文物工作逐步走上了正确的轨道。1984年，国家民委和文化部文物局联合召开了全国少数民族文物工作会议，与会代表向全国发出了关于抓紧抢救和保护民族文物的呼吁书。此后，各级党委、政府加强了领导，积极关心和支持民族文物工作。有

条件的地方已修建了民族博物馆，对本地区民族文物开展了一系列的普查、保护和征集工作，一大批珍贵的民族文物得到了及时抢救，馆藏民族文物数量迅速增加。如：海南民族博物馆征集收藏民族文物近3万件（套）；云南民族博物馆现有云南26个民族的各类文物4万余件（套）；广西民族博物馆征集收藏广西各民族文物3万余件（套）；贵州民族博物馆征集收藏贵州各民族文物1万余件（套）。另外，成立于1959年的民族文化宫博物馆，收藏了近5万件（套）各民族文物精品。1998年，国家民委和国家文物局又联合在广西召开了“全国少数民族文物工作会议”。会议总结了改革开放以来民族文物工作取得的成就，对民族文物的进一步抢救征集、收藏保护工作提出了很好的意见，使民族文物工作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历史阶段。

作为民族文物收藏保管、展览宣传和研究利用的场所，民族博物馆越来越受到国家和地方各级政府的重视。近年来，民族博物馆在数量和规模方面都有了显著增长，我国已有民族博物馆近400座。目前，我国20余个少数民族已经拥有自己的博物馆；少数民族聚居的西部12个省区，拥有500余座博物馆；30个民族自治州，120个自治县大部分都建有民族博物馆。近年来，又出现了一批独具特色的市县级民族博物馆。此外，许多民族乡镇也建立了文物陈列室。据不完全统计，当前我国各级各类民族博物馆馆藏民族文物近50万件（套），数量可观。

为了总结、宣传和展示民族文物收藏、保护工作成就，弘扬各民族优秀文化，促进民族文物博物馆界的交流与合作，中国博物馆协会民族博物馆专业委员会和辽宁民族出版社合作，共同推出《中国少数民族文物图典》系列丛书。此套丛书已列入“十二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获国家出版基金资助。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现代化进程的加快，科技与经济进步所带来的人们的观念、生活方式等的深刻变化，民族文物既面临得到收藏、保护、研究、展示和合理利用的良好机遇，也面临有史以来最强劲冲击的挑战，许多具有历史、科学和艺术价值的近现代少数民族建筑得到国家和社会的保护，也有不少濒临毁灭。许多数年前、数十年前一些民族使用的生产工具、生活用品正在

迅速消失而未能及时征集保存；许多具有艺术价值和鲜明民族特色的工艺品大量流失。这些新情况、新问题，对新时期民族文物工作提出了新挑战。

新时期，党和政府确立了推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方针，强调要加强对各民族文化的挖掘和保护，重视对文物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这为民族博物馆事业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历史发展机遇。尽快规范民族文物管理，提高民族博物馆收藏保护民族文物的质量和研究利用好民族文物，成为当前快速发展的民族博物馆事业的首要工作任务。

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民族文物和民族文化保护工作。2009年6月，国务院召开了全国少数民族文化工作会议。2009年7月5日，颁布了《国务院关于进一步繁荣发展少数民族文化事业的若干意见》，2014年12月，党中央、国务院印发了《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民族工作的意见》，指出“加大少数民族优秀文化遗产保护力度，实施重点文物保护工程”等，为民族文物、民族文化工作的继往开来指明了方向，也对加强少数民族文物和民族文化工作提出了明确的要求。我们要认真贯彻落实《意见》精神，使民族文物在推进现代化建设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进程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是为序。

中国博物馆协会民族博物馆专业委员会

2014年12月于北京

前言

如果把北极圈附近的大陆和岛屿想象成一幅环北极垂挂的罗裙，那么，地图上标示着驯鹿分布地的圈圈点点，就好比是一把撒在这裙摆上的珠子。这把珠子，在中国境内遗有一颗，那就是大兴安岭林海中的敖鲁古雅。

中国民族博物馆探寻东北亚驯鹿文化的调查行动，就始于敖鲁古雅。内蒙古自治区根河市的敖鲁古雅鄂温克族乡是驯鹿文化在东北亚抵达的最南端，它是历史遗留给北中国的最后一粒驯鹿文化之珠。从这里北上探入俄罗斯西伯利亚原野上那些依然奔跑着驯鹿的村庄：埃文基人的、埃文人的、那乃人的、克里亚克人的、楚克奇人的……纵观历史，中国民族博物馆在2013—2015年间所开展的东北亚泛北极圈驯鹿民族文化调查与文物征集，是迄今为止我国文博系统涉及驯鹿文物事项所开展的最完整、系统的调查和收藏工作。这场历时三年、纵横五千里的文化追寻，既在空间意义上展开，也在文化反思意义上展开——研究人员既追随驯鹿群在季节间迁徙往复、来来去去的足迹，也探寻东北亚驯鹿文化在工业化时代进退消涨、兴衰嬗变的历史辙印；如果说前者为调查所获文物注入了民族学人类学的阐释意味，那么后者则使研究者在对驯鹿这项独特的人类文化现象的观照中，触及到了一个对现代文明进行生态与文化反思的幽秘视角。

二

有很多条线可供划出前现代文明与现代文明的分界。而其中格外显著和分明的一条线，就是人与自然的关系——当人与自然的紧密依存成为文明存在与发展的主要支点时，这就是前现代性文明；当人对自然完成了“祛魅”历程，并建构出人与自然的二元分立，进而将人的自身发展建立在对自然的克服与超越基础上时，人类就迎来了现代性文明。从这个意义上说，地球泛北极圈地带的驯鹿文化是一个典型的前现代文明样本，它在空前高涨、无度扩张的现代性尚未抵达的极地空间里，独自残存，并浮现最后一丝悠然神情。

驯鹿是地球上唯一一种无论雌与雄都长角的鹿，又名角鹿。驯鹿环北极而生，分布于北欧、北美、俄罗斯、蒙古国与中国等地的亚寒带针叶林中，栖息于森林、冻土地带和沼泽地长有石蕊且积雪不多的地方，以苔藓、地衣等低等植物为食。因为擅长在泥沼、森林和雪地中行走，驯鹿被誉为“林海之舟”；又由于性情温顺，驯鹿被称为“瑞兽”。

人类与驯鹿之间建立起的紧密关系，可以上溯至新石器时代。生活在北半球严寒地带的一些狩猎民族，创造了逐野生驯鹿而居、以驯鹿作为主要经济生活方式和精神世界重要因素的驯鹿文化。地球上驯鹿文化的主要创造者是北欧拉普人(Lapps，又称萨米人)、亚洲大陆北部的北通古斯族群、北美因纽特人……至今，全世界仍有20多个民族、10万人在饲养驯鹿，驯鹿总数达到250万头左右。

16世纪至17世纪中叶，追寻着野生驯鹿足迹到达贝加尔湖西北勒拿河流域的一群北通古斯人，于18世纪又以驯鹿为运输工具，沿着石勒喀河迁徙到额尔古纳河流域，来到大兴安岭北段狩猎和饲养驯鹿。这个被清代史籍载为“使鹿部”的族群，即是当代中国驯鹿文化守望者——敖鲁古雅驯鹿鄂温克的祖先。近半个世纪以来，驯鹿鄂温克经历了定居、农耕等一系列重大文化变迁，至今，敖鲁古雅乡鄂温克族人有200多人，大兴安岭密林中散布着他们的6个驯鹿养殖点，共计存有1200多头驯鹿。

三

对于语言的寻究总能带来一些历史真相的澄现。比如对于“鄂伦”一词的溯源。在通古斯语中，“鄂伦”至少可追溯出三重含义：驯鹿；苔原高地；泛北极圈东北亚众多通古斯人的自称。

上述三种词意寓于同一个语音，表明历史上通古斯人与驯鹿、苔原高地所缔结起的三位一体的历史关系。而人、地、鹿之间的紧密扭结，则喻示着人与自然高度依存的一种生命哲学。

早在新石器时代，生活在北半球严寒地带的狩猎民族即创造了驯鹿文化。这一种文化呈现出人与自然结成生命共同体的朴素而深邃的生态逻辑——驯鹿是北极圈民族的肉食来源，但同时驯鹿还为森林民族提供其他重要的衣食之源：鹿乳营养价值极高，每升驯鹿乳可产生2000~2500卡热量，高于牛、羊乳；鹿皮是上等御寒材料，可缝制衣、裤、帽、手套、褥子等；未加工的驯鹿毛皮可做睡袋和雪橇的遮盖物；驯鹿骨和角可制成各种生活用具：刀把、针盒、雪铲、套索环



等；如果骆驼是“沙漠之舟”的话，那么驯鹿便是“森林之车”。驯鹿行走时步态平稳，骑乘者极其舒适。每头壮鹿最多可载重五十公斤，日行七八十公里。历史上，通古斯人很早就开发了驯鹿运输业。驯鹿在原始森林地带曾被广泛用于邮政运输和货物运输，租赁驯鹿运输业曾为通古斯人带来可观的财富。

所以，尽管受到技术和工具的制约，但依托北极圈的辽阔地域和丰富资源，驯鹿民族并未遭遇过严重的生存危机，驯鹿文化系统表现出高度的稳定性。以中国境内的使鹿部落为例，学者们研究发现：历史上驯鹿鄂温克的生活并未发生过严重的衣食之忧。

驯鹿民族热爱自己的生存方式，驯鹿文化体现出人与驯鹿之间的亲密关系。比如敖鲁古雅的鄂温克人从不轻易宰杀驯鹿，只有实在打不到猎物或驯鹿受外伤无法医治时才吃驯鹿肉。而驯鹿则在漫长的历史中，逐渐深度介入北极圈民族的精神生活——驯鹿崇拜是驯鹿民族最重要的自然崇拜；通古斯人把驯鹿作为人与某些神灵之间的媒介，死者的灵魂借助于它前往另一个世界。通灵者萨满的灵魂不仅变成鹰，有时还化成驯鹿的姿态出现。而萨满的神帽上普遍饰有两枝高耸多叉的鹿角。鹿角被认为是萨满庇护神的储藏所，鹿角成为萨满服最突出的标志，一叉叉向上伸展的鹿角被认为是通天的象征，像萨满神梯一样是萨满灵魂上行的凭借物。由于萨满能力不同，他们所能到达的天界层面有所不同，所以鹿角的叉数又代表着萨满能力的级别。

驯鹿文化的生态逻辑，还体现在一个重要环节：由于驯鹿喜食森林苔藓、石蕊，而这类植物系多年生，如停留在一个地区长期放牧，苔藓根部会被吃掉，所以驯鹿者经常搬迁，三五年内不去

曾经放牧过的牧场。这种游猎方式客观上扼制了人对森林苔原原始植被的破坏，保护了生态平衡。

我们有理由认为：驯鹿文化是北极圈民族在地球上最不适合人类生存的地方所发明的一种基于人与自然高度依存关系的智慧生存方式。

四

在北极圈驯鹿文化的历史舞台上，我们看见中国的鄂伦春族留下了一个意味深长的背影。即便在现代通古斯语中，“鄂伦春”的语意也明确地指示着一个意义：“饲养驯鹿的人”。语言学揭橥了中国东北民族鄂伦春在历史上曾经与驯鹿之间缔结的紧密关系。但与敖鲁古雅鄂温克不同的是，近代以来鄂伦春的生活中并无驯鹿。那么，一个以“驯鹿者”为族名的民族，为何近代以来其生活中了无驯鹿踪影？这意味着在过去二三百年间这个民族曾经发生过一次重大的文化断裂。失去驯鹿的鄂伦春人在走进清代典籍时，他们已演变成骑马者的形象——清康熙年间，鄂伦春被记录为“摩凌阿鄂伦春”（骑马的鄂伦春人）和“雅发罕鄂伦春”（步行的鄂伦春人）两个部落，这表明鄂伦春在早清时期即与驯鹿相离失。曾经作为“使鹿部”重要成员的鄂伦春，在约三百年前已完成了向森林游猎鄂伦春与农耕鄂伦春的分流。

驯鹿从一个民族历史中走失，最有可能的缘由是环境的演变。所以，顺着驯鹿的足迹，追寻到的也许不仅是一种动物的往复，更有可能是一个民族的历史，一种文化的进退，一个生态环境的沧桑之变。事实上，中国民族博物馆所组建的调查小组在从敖鲁古雅出发前，更先的起点是鄂



伦春。探寻鄂伦春对于驯鹿文化残存的记忆，那些依稀但顽固的情感，那些遗留在传说、歌谣中的残碎片断——对于这一切的记录与搜集，才是中国民族博物馆驯鹿文化追寻的真正起点。而文物调查与征集中的文化反思之芽也渐渐萌生。

事实上，当调查小组进而深入俄罗斯境内驯鹿人的村庄时，一幅关于驯鹿民族近代以来的历史嬗变图便终于清晰地展现在眼前了——这是一幅东北亚驯鹿文化正在逐渐向北方退缩的趋势图；随着现代化的推进，随着全球气候变暖、冻土带北移，北极圈民族正在上演着越来越多的与驯鹿文化相离失的故事。

进入21世纪以来，人类驯鹿文化呈现出衰减的趋势：从事驯鹿饲养业的民族人口总体数量在减少；原始森林类型养鹿业呈明显下降趋势；各驯鹿民族中家养驯鹿的数量亦急剧萎缩。比如，作为拥有世界上驯鹿数量最多、驯鹿饲养业类型最多样化、驯鹿民族单位最多的俄罗斯，却难掩其古老的驯鹿业正在走向萎缩与衰减的趋势。仅在21世纪前十年，俄罗斯从事驯鹿业的民族就从传统的19个减少到16个；十几年前，克特人、恩加纳桑人和涅吉达尔人、卡累利阿人甚至部分古老的从事驯鹿饲养业的俄罗斯人，都基本上放弃了这一生计方式；在托法位尔人中，驯鹿业的自然边界已经消失了，奥罗克人的驯鹿业也已经遗失了。

驯鹿文化的历史进退，首先与森林苔原资源的生态进退相一致。从地球大气环境看，全球气候变暖，北半球冻土带快速地发生从南向北的消融之势，驯鹿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急剧变异，其耐以存活的主食苔藓随着冻土带向北方退减，由此驯鹿不得不北移，一些泛北极圈民族为此被迫

放弃驯鹿生活方式，从山林退出，走向定居，走进城市。

其次，驯鹿文化的历史进退，还与工业化的进逼路线紧密攸关。一百多年间，工业化进程咄咄逼人，驯鹿分布地被北进的工业化浪潮各个击破；东北亚泛北极圈民族由南向北渐次解除与驯鹿的依存关系，这一条路线正是现代化逐渐向北推进的路线。

所以，驯鹿的足迹，一方面交织着近代以来东北亚泛北极圈地区的地理气候变化史，它深刻地展示出我们时代地球面貌正在发生的沧海桑田；另一方面它又呈现出现代化进程为北极圈民族带来的文化演变，隐现着一种古老生态文化的历史进退，交织出自然生态与民族历史、经济生活、现代文明的深刻关联。我们由此可以看出现代性作为背后真正操控手的历史真相。

五

对于前现代文明遗存物的搜寻与收藏，构成当代博物馆繁忙的日程，成为其当然的文化使命。但是，如果这种搜寻与收藏仅仅用以拼凑人类的前现代记忆，并以此充当对“现代”的旁证与映照，那么，博物馆在当代世界的角色就仍旧不过是现代性的一台加速器。事实上，对于前现代生活的意义呈现，使博物馆成为人类文化线性阶梯进化论的反叛者，为现代性提供集中而强烈的反思。这使当代博物馆获取其一个重要的功能，即以人类文化多样性的呈现，为跨文化理解与相互认同提供重要场域。

2014年8月，中国民族博物馆甄选馆藏东北亚民族文物精品，同时以有着长期合作关系的



敖鲁古雅博物馆部分藏品作为补充，精心策划与制作了《寻找“鄂伦”的足迹——泛北极圈东北亚驯鹿民族文化展》。展览所展示的各种驯鹿文物，一一道出发生在中国驯鹿文化孤岛以及西伯利亚驯鹿者村庄的故事，呈现出驯鹿文化的地理与历史变迁。驯鹿文化的器物言说出驯鹿民族源自祖先的对驯鹿颠扑不破的固执依恋与守护——不论是作为生活资源的驯鹿，还是作为漫漫冬日长途跋涉之骑乘工具的驯鹿，抑或是作为人与神灵之间的媒介的驯鹿，以及那些被埃文基人用来制作精美褥垫的历史悠久的驯鹿皮毛艺术。而由文物来完成的驯鹿叙事，比起那些文化他者的记录与转述，更为质朴与本真。

“驯鹿的足迹”让人深味人类古老传统文化的价值；“寻找驯鹿的足迹”，则让人反思全球化时代的自然、生态以及人类的选择。这个关于驯鹿文化的主题展，提供了一个关于人类命运与自然相依存的深刻寓言。“当这种与独特的自然地理高度相融并达成了极其和谐关系的古老生计传统一步步走向衰竭时，人类在这里能做出更好的生计选择吗？”展览在“结语”中写道。

对于正在忙碌地搜寻与收藏前现代文明遗存物的博物馆来说，借由藏品向现代性提问，这正是其当然的职责。

中国民族博物馆副馆长 郑 茜

2015年12月